

## 走過五四：反傳統風潮下 的知識婦女與婦女知識

連 玲 玲\*

「五四」在中國近代史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不論是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大學校園裡所發起的學生愛國運動，或者是 1915 年《新青年》的出版所引發的新文化運動，都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特別表現在對傳統權力結構的挑戰：學生以激烈手段向當局抗議中國外交的屈辱，《新青年》呼籲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在在打破傳統的政治、社會與知識權威。對於婦女史而言，五四更是關鍵議題，不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女權的啟發，並有所謂「新女性」論述的出現，或者是後來學者（尤其是明清婦女史）對於五四女性論述的反思與修正，五四都可以說是近代中國婦女史的催生力量。然而，除了聲音響亮的「獨立自主」論述，「五四」在時人的生命歷程中留下什麼樣的痕跡？我們又如何衡量五四對當時婦女的影響？正當五四屆百年之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研究所舉辦「走過五四：反傳統風潮下的知識婦女與婦女知識」國際學術研討會，以重新評估五四與婦女的關係，本刊第 33 及 34 期專號，即為該次會議的成果。<sup>1</sup>

## 五四與知識婦女：再思「新女性」

五四對於婦女史研究留下最大的遺產便是以新舊二分法的框架來理解婦女。胡適曾定義「新婦女」為「一種新派的婦女，言論非常激烈，行為往往趨於極端，不信宗教，不依禮法，卻又思想極高，道德極高。」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立」的精神，包括人格、經濟與婚姻的獨立。<sup>2</sup> 站在新婦女對立面的舊婦女，則是「保守性太重」、「判斷力缺少」、「依賴心太重」。<sup>3</sup> 這種說法雖然簡單明瞭，但完全忽略婦女特質的動態變化。本刊第 33 期「知識婦女」的三篇論文，都從「生命史」的角度重新省思「新女性」究竟何意。黃錦珠以女作家陳小翠為個案，探討「閨秀作家」在新時代的處境。明清以來盛極一時的才女文化，到了近代卻被視為無濟於國家、不符合潮流的「舊學傳統」，甚至成為被新知識分

---

<sup>1</sup> 本次會議於 2017 年 12 月 17-18 日召開工作坊，後於 2018 年 6 月 19-20 日舉行正式的學術研討會。同一會議上柯惠鈴所發表的論文〈「烈士向警予」：中共對五四激進女性的革命書寫與塑造〉，已出版於本刊第 32 期（2018 年 12 月）。

<sup>2</sup> 胡適，〈美國的婦人〉，《新青年》（北京），卷 5 號 3（1918 年 3 月），頁 222。

<sup>3</sup> 張希遠，〈從實際上觀察中國舊婦女的弱點〉，《婦女雜誌》（上海），卷 7 期 8（1921 年 8 月），頁 112-113。

子批評的對象。不過即便五四新文化運動大張旗鼓地推行白話文學，仍有一批作家堅持以文言文寫作；陳小翠就是這樣的例子，不論詩詞、曲賦，甚至翻譯小說，均以文言書寫。她對婚戀問題也持保守態度，不但自己接受父母安排，也視自由戀愛為受外界誘惑而產生的墮落行為。不過她卻積極參與「公領域」的活動，不僅頻頻在媒體上發表作品，也組織女子書畫會舉辦展覽，更在新房中為來賓簽贈個人詩集，儼然是暢銷女作家的作派。

秦方以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為例，探討這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對於身歷其境的女性而言，有什麼樣的意義或啟發。從許多方面來看，她們都可稱為「新女性」：受過新式教育，對於女權有高度的自覺，並且均突破了傳統對女性的種種限制。更特別的是，她們都參加了五四運動，一起集會、遊行、被捕，後來又都趕上勤工儉學的列車。這些經驗使她們與共產黨走得愈來愈近，不過卻又因為個人抉擇而有各自的人生軌跡：劉清揚成為社會運動領袖，郭隆真成為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張若名則淡出政治、潛心於學術研究。

葉韋君以《婦女共鳴》為軸線，探討新文化運動對後五四時期婦女的影響。由於這份刊物發行時間較長，可以看出編輯與作者的世代差異：第一代編輯社談英出生於 1891 年，親歷辛亥革命，為爭取婦女參政權大聲疾呼。第二代編輯李峙山參與過 1919 年的五四運動，早年與周恩來、鄧穎超等人合組進步社團，思想上較接近左派。第三代編輯陳逸雲，五四運動發生時年僅 11 歲，讀大學時已加入國民黨。

從這三篇論文所提及的婦女生命歷程來看，「五四運動」

有著不一樣的意義，它可以是政治舞臺的跳板，或是投入社會運動的熱身，甚至也可能是挑戰既有價值觀的「洪水猛獸」——當然，行動者更可以對它作出不同的回應：熱情擁抱、激烈抗拒、漠然以對。這些作者提醒我們，「五四世代」並非一個整體，而呈現出相當多元的面貌，使得研究者必須正視「誰的五四」、「何時的五四」等問題。此外，由於「五四」與「新女性」經常被相提並論，也使新文化運動中的「新、舊文學之爭」與「新、舊女性之爭」掛勾。然而「新女性」不但無法以文學表達形式來定義，她本身就是一個時代的產物：1910年代的「新女性」，到了1930年代就可能「變舊」了；辛亥革命前後大力鼓吹女權的談社英與張默君，到了《婦女共鳴》發刊時，即被稱為「傳統才女」。因此，關於「新女性」，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一個「更全面」的定義，而是能呈現出時間變化的概念；這三篇論文所示範的「生命史」研究取徑，為我們展現新的可能性。

### 五四與婦女知識：知識的性別化

第 34 期的三篇論文乃環繞「婦女知識」這個主題。此處的「婦女知識」有兩層意思，一是關於婦女的知識 (knowledge about women)，一是提供給婦女的知識 (knowledge for women)。民國時期對於「認識婦女」的社會需求日趨增加，即衣若蘭所謂「五四時期是一個重新認識婦女的時代」；但為什麼需要認識婦女？是因為婦女成為社會

問題的來源；為了要了解發生問題的原因，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必須認識婦女。衣若蘭和連玲玲的論文分別從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角度探討知識分子如何重新認識婦女。衣若蘭選擇民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婦女史專著《中國婦女生活史》為研究對象，探討該書所呈現「五四史觀」的知識脈絡與架構，進而從性別角度看民國「新史學」的形塑。從題材選取及語言表述可以看出，陳東原的重點在於突顯歷代以來中國婦女的「問題」，而問題的來源是宗法，也因此他以大篇幅探討婦女在婚姻家庭中所受的壓迫。正如衣若蘭評論，該書並非如其書名所言，是一部中國婦女的「生活史」，而是一部描寫女性被摧殘的歷史。也可以說，陳東原要談的是婦女問題，並從歷史尋找佐證的材料。

連玲玲根據社會調查的分析觀察到類似的現象。社會調查這種知識工具原本就是用來發掘社會問題，受過五四新文化洗禮的燕京大學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社會系女學生，不但以此發現婦女問題，更藉此讓女性發聲，進而使她們的意見可以被納入社會學知識的範疇內。就像陳東原以「五四」作為傳統與現代的歷史分水嶺，女學生的社會調查也深受其影響，把婦女問題的核心指向父系/夫系家庭的權力結構。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關於婦女的知識並不是出於對婦女本身的關注，而是把婦女當作論述的工具，結果反而模糊、甚至扭曲了婦女在歷史及現時情境下的生活狀況，換言之，陳東原的婦女史及燕大學生的婦女調查都是五四意識形態的產物。

相較前兩篇論文著重於知識分子如何描述婦女問題，黃相輔以科學常識為範疇，探討知識分子針對婦女問題所提出

的解答。晚清以來女子教育的發展是新式教育的重要成果，不過五四時期論者對於女子教育的目標卻各執一詞，光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就有「賢妻良母的教育」與「人的教育」之爭。不難想像，前者所提倡的科學常識以流行於日本、美國的家政學為本，後者則以科學來駁斥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特別以「男女同為人」為論證基礎。儘管男女在生理構造上有所不同，但人作為物種，作為自然環境中的存在，作為抽象思考及藝術創造的主體，男女所需要的教育是一致的，換言之，支持「人的教育」的知識分子不但用科學（生物學、社會學、數學等）來泯除知識的性別差異，也跳脫「實踐社會角色」的教育目標。

這三篇論文除了揭示婦女知識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展現了知識建構的性別面向。「知識轉型」是近代史的重要課題，不論是舊學問的擴張和典範轉移（如史學），或者全新知識門類（如社會學和科學）的出現，它代表著認識論的新框架。針對這個課題，學界已有許多著作，不過甚少人從性別的角度來理解知識轉型的過程。<sup>4</sup> 沿用 Joan Kelly 的提法，我們可以質問「婦女是否（或如何）經歷知識轉型？」<sup>5</sup> 這三篇論文所揭示的是「男性提出、女性追隨」的知識建構模式，

---

<sup>4</sup> 近年來知識轉型相關的論著甚多，較新者為張壽安編，《晚清民初的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該書乃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的成果，共收錄9篇論文，無一觸及性別議題。

<sup>5</sup> 參考 Joan Kelly-Gadol,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in 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pp. 137-164.

即以男性觀點來認識婦女，而女性隨之附和，即便女大學生試圖讓人聽到婦女的聲音，卻不啻是以婦女之口發出男性的聲音(masculine voice)，這就使得女性在知識體系裡仍居於屈從的地位，未能挑戰傳統的男性知識權威，也遮蔽了女性在現實生活中所展現的能動性。這使我們進一步反省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女性而言，是否真能帶來新的知識權力？

本次專號除了六篇專論，也包括「百年家庭變遷」的圓桌論壇，最初發表於中研院「五四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年5月2-4日），先把「五四」作為歷史論題提出，然後實際觀察百年來中國和臺灣家庭制度究竟有何改變。這是一場很有趣的跨學科對話：百年前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激烈地抨擊中國家庭的「傳統與封建」，這些批評究竟對中國社會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在多大的程度上，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有效地」擘畫了中國社會的未來？幾位社會科學家不約而同地指出，儘管「自由婚戀」、「男女平等」等理想逐步地在制度上得到支持，但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文化規範仍然是一股強大的社會力，父權(patriarchy)、父系(patrilineal)及隨夫居(patrilocal)仍是華人家庭的主流，甚至五四青年所極力撻伐的「包辦婚姻」以更商業化的方式存在於百年後的臺灣。無怪乎學者認為這場革命仍是未竟之業。

但這場一百年後還被人紀念的運動要如何能「竟」呢？也許「未竟」並不是件壞事，畢竟紀念某個歷史事件總也反映了當下的問題。正如張小虹教授所言，「五四不死，不在於對話語權無止休的爭奪，而在於對五四各種創造性挪用與歪讀，我們要的不是五四線性意義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我們要的是五四的『將臨』，在不同時空中所發生的各種異質強度貼擠。」<sup>6</sup> 從生命史和知識建構的角度，我們看到了有婦女、也有性別的五四。

---

<sup>6</sup> 張小虹，〈男人的五四，女人的廁所〉，《聯合報》（臺北），2019年5月4日，A12版。